思旋天地

思旋

老師給媽媽的信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隨着暑假揭開序幕。很多家長帶着孩子，拖着行李箱為孩子書櫃「進補」。猶記得五年前，有一位十二歲小女孩出版了一本一萬二千字的英語小說《Fantasy and Reality》，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讚歎不已的事情，但大家萬萬想不到當初她媽媽如很多父母一樣，小女孩每寫一句句子，便會檢查文法有否錯誤、有否串錯字。直至一天媽媽收到老師寄給她的一封信，內容是老師勸告媽媽不要再改小女孩的作文，因為老師發現學生上作文堂時，怕串錯字而不敢下筆。多謝老師提點，否則關愛孩子的母親會成為劊子手，老師的理念是學生需要從錯誤中學習。這個故事正正解釋許多家長疑團：為什麼小朋友小時不怕錯，放膽說英文，到了小學、中學反而不敢放膽說？

你們的孩子很聰明，一開口就會給你捉錯處，傻瓜才會令自己不好過！不少孩子終於肯開口細細聲讀生字，家長就大聲罵：大聲點！再讀一次！第二次孩子就不敢讀了！學習語言最重要的是優良語言環境。所以，你想小朋友學好英文，其實很簡單，為他們製造一個開心、得到你欣賞學習英文的經驗。

還記得你是怎樣鼓勵小朋友學走路，我們不是捉住他的腳一步一步行，亦不是他跌倒時便破口大罵，而是當他每行一步都會讚賞他、鼓勵他。一個人最大成功的推動力，就是被認同，所以年紀小小，真的不需太在意其文法正確否、發音準確否，精益求精應該在學生有一定基礎才開始還不遲，例如高小或中學。

一個愉快的英語學習環境，讓小朋友好自然、好輕鬆對話，像說母語一樣，這是對小朋友努力的肯定，亦是成功學習的經驗。此一道理，不單是學習語言，放諸四海皆準，寄語每位父母，盡力為孩子製造一個有愛、包容的成長的環境！

隨想國

興國

由荊字談起

如果現代的國文課，以荊字造句，有多少中學生能造出句子來？或許聽過負荊請罪這句成語的，可以造出。又或者知道有荊棘這種灌木的，會以荊棘滿途來造句，至於拙荊、荊妻是對妻子的謙稱，恐怕年輕學生多數就不會使用了。

如果問學生荊是怎樣的一種植物，相信讀過蘭相如和廉頗的故事的，都會認為荊枝上長有刺，因為以前的插圖，畫的是廉頗身上披着帶刺的枝條去向蘭相如請罪，卻原來荊，和荊棘是不同的植物，荊無刺，可以做鞭，而荊棘是帶着刺的。以前的插圖，誤以為荊就是荊棘了。

最近商務印書館出了一本好書，是由馬星原繪圖、方舒眉撰文的《趣味學古文》，以輕鬆的漫畫形式，配以生動的白話文，將古文的含義一一道出，書中還附上中國語文科十二篇範文，讓讀者透過漫畫和敘事，逐步接近古文。這本書裡面也繪有負荊請罪的故事，但那荊，卻是真正的荊，無刺的。

翻看着《趣味學古文》，我想起讀中學時背誦古文之苦，但如果不是那時的背誦，又焉能記憶到現在？又焉能時常引用「陰風怒號，濁浪排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和「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些古文的句子？

通古博今，無論是做學問或者做人，都大有好處，如果害怕背誦而拒古文於千里之外，先天上就是做人做學問的敗筆。就像荊這種植物，為何會那麼多人認為是有刺的？想來和耶穌身上的荊棘有關吧？但要認識耶穌，西方的讀書人也要讀西方的古文典籍啊！

琴台客聚

胡野秋

標識的魅惑

無論承認不承認，我們對一座城市的記憶都來自於建築物，假如香港沒有中銀大廈、北京沒有天安門、上海沒有外灘洋樓、深圳沒有地王，那麼這些城市的面孔便永遠是模糊的。往遠處說，巴黎的艾菲爾鐵塔、倫敦的大笨鐘、紐約的帝國大廈，無不是城市最忠實的名片。

我們現在習慣用「地標」來稱呼它們。

地標者，地域之標識也。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迷茫於歷史承載的幽境中。歷史學家們常常爭論一些本不該成為問題的史實，原因在於，除了文字記錄之外，能夠佐證歷史的實物已經蕩然無存。如果沒有項羽的一把火，阿房宮就不會那麼迷霧重重；如果西安不被毀滅過十幾次，那麼先秦歷史就不用再靠我們猜謎了。

文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它具有先天的虛擬性，一個不在場的人完全可以寫出在場的文字，金庸沒去過峨眉山的時候，就寫出了《天龍八部》。而建築則無法說謊，一旦矗立，就是凝固的歷史。所以歷代統治者比起害怕文字，更害怕建築，他們改寫建築的唯一手法只能是：摧毀。

因此，中國的歷史注定是一部摧毀與重建的歷史。

城市的標誌是建築，建築的標準又是什麼？同樣難以琢磨。

大到地名，小到樓名，都是玄機。地名是一個城市文化、性格和品位的體現。而不同城市的命名方式則反映了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質，以及城市的不容抹去的痕跡。

現在中國富了，大廈多了，便出現了一大堆讓人皺眉的名字，動不動就是「財富大廈」、「豪門名苑」，彷彿金子無處可放，只好貼到臉上。

這幾年房地產紅火，樓盤名稱已經在悄悄地翻新，最初只是乾巴巴的「高樓」、「大廈」，後來演變成了「花園」、「廣場」，眼下又加進「智能」、「E時代」等新玩意兒。

城市的命名方式實際上是城市基因的自然呈現。比如，北京是皇城，城門多，護城河長，因此這「門」那「門」、這「橋」那「橋」就多，連「墳」都是公主墳、八王墳，這就是帝王文化的遺蹟。上海是老資格的移民城市，所以她把全中國的城市一攬子都收進去，從「南京路」到「西藏路」、「青島路」再到「烏魯木齊路」，應有盡有。

其實對於地球而言，人只是短暫的過客。那麼在這個有限的地球時光，人類需要靠一種物化的形態來維繫他們脆弱的根基，只能依託於建築。海德格爾曾在他的大量作品中描述了人對於自己「暫住於大地」的永久性的不安，所以他老人家才喊出了「詩意地棲居」。

棲居讓人想起鳥，「棲」字偏旁屬木，就是「鳥兒住在樹上」的意思。其實人類最初也和鳥兒一樣住在樹上的，范文瀾之類的歷史學家告訴我們，興許是一場大火把人類趕下了高高的樹幹，從此猿變成了人。

猿變成人之後，開始注意住的問題。起先偷懶住現成的山洞，後來開窯洞。平原沒洞可開，只得搭棚子，搭着搭着，就成了形。北方的胡人沒那麼大耐心，氈房和蒙古包成為他們流動的棲居之所。他們追隨着白雲和羊群，在一切水草豐沛的地方居住下來。

而自有居住的概念以來，人類相互之間的差異就愈發拉得大了，故而才有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捶胸頓足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那樣的千古一問。詩人他老人家求親告友，在成都浣花溪畔好不容易蓋起一座茅屋，不料到了八月，一場大風破了新房，豪雨趁虛而入，想起和他命運相似的「天下寒士」，老詩人怎不忿忿然。

當然，有人也許會說，地名、樓名不過只是個符號，能有所指向便達到目的，那需要它好聽。

這話雖有道理，無論人名地名都只是一種符號，不過誰也不想把自己叫作「二狗子」。

百家廊

若荷

菊子的鄉愁

前些日子，在養馬島讀書節中，我參加了「藍色牟平」文學采風活動。我們一行十幾個人，按要求同時進島，然後入住，一起參加活動。那天，因為走錯了路線，我多倒了幾次車，趕到賽馬場賓館，天色就有些晚了。等我安排好住處，這才發現有一個人來得比我更晚，她在樓道裡轉來轉去，找菊子，菊子和她同住一個房間。

菊子是一位詩人，在我們這些文友中，詩人很少，菊子是唯一的一個。詩人的語言，總是充滿詩情的，和菊子聊天，都讓人如沐詩風，聽着聽着，便想用詩來會話，用詩來寫作了。詩心是美麗的，是可以相互感染的，它年輕着，跳蕩着。再蒼老的人，擁有一顆詩般的心，生命也會年輕起來、奔放起來。

剛見面時，我不知道她叫菊子，後來經別人介紹，才知她叫這個名字，我只感到，這個名字真好，是那麼熟悉。哦，我想起來了，許多年前，我就曾寫過一個叫菊子的女子，後來那篇散文，選入了二零一一年中國散文年選，我是記得清楚的。潛意識裡，也還是沒有忘記。

菊，本就是個多愁的字眼；菊子，本來就是一個善感的名字。

「菊」這個字，不張揚，不嬌貴，既厚道，又樸實。叫的人，不用費勁，不大聲喧嘩，只需輕啟雙唇，吐字如蘭，就可以了，就可以輕輕地喊一聲——菊，讓叫這個名字的和被叫的人，都像極了吟詠的詩人。

於是，只要有活動，我都會看到菊子。我們一起行走在養馬島上，不離左右，菊子也把自己的故事講給我們聽。那繁忙的采風路上，常常看到菊子的身影，響起菊子的聲音，也響起人們喚菊子的聲音。

自此，那三天裡，那一路上，只要有菊子的地方，都會有人喊，「菊子，菊子！」

我沒有叫過菊子的名字，只是默默地去關切着她，關注着她身邊的一切。儘管我沒喊過一回菊子，但卻每每去猜想，暗暗去解構這個名字，比菊子本人，更想給它一個美好的詮釋。

要怎樣去喊，才能夠讓這個名字更加親切、響亮？

菊子，菊子，菊 — 子……

這是一個溫柔的名字，帶了一縷濃濃的鄉土氣息，像枝素默而挺直的花朵，生長、挺立，讓人想起北方的菊，在田間、在地頭、在河畔、在山上，哪裡有土壤，哪裡就有她的身影。菊子說，起這個名字，就是因為喜歡這種花、這個字。這個字，總會讓她想起家鄉，想起家鄉的菊……

菊子來自大連，來自大連的菊子，牟平是她的故鄉。

在去龍泉鎮參觀新農村建設的路上，往返的途中，就能看到菊子的村莊，一排排房屋在車窗外一閃。一閃，菊子已認出了它的模樣，光陰為它披滿了滄桑，它卻仍然坦然、慈祥，靜謐地坐落在故鄉的土地上，宛若已到暮年的老人，在漫長歲月中，已習慣了質樸如山，沉默不語。

那一排排房屋，總有幾間是菊子所熟悉的。菊子在那裡出生、長大，十七八歲的時候，隨父母移居大連，從此別離了故土，故鄉的山水也從此化作了永遠的夢境。大連給了她女性的成熟和甜美，給了她不凡的成就和豐富的閱歷，而家鄉的這個村莊，卻給了她天真的童年和快樂的記憶。

菊子在采風的車上看到路邊的村碑時，眼就紅了，眼睛裡彷彿陡然飛進了什麼，她緊張而羞澀地躲閃着，不讓別人發覺。獵獵的風也助她，用揚起的秀髮遮擋着，遮擋紅了的眼眶。是多麼難以言喻的悲喜？菊子躲閃的目光不會讓你看到，但是一扭頭，她的眼睛裡就盈滿了淚花。

菊子說，她離開家鄉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今次是第一次踏上故土，看見自己曾經住過的村莊、村外的小路，以及村旁沿着歲月生長的植物。她的雙腳一踏上故鄉的土地，便捕捉到了家鄉莊稼成熟的訊息。

菊子曾去找過童年的房屋，想去看看那些熟悉的鄰居，然而她沒有想到，無數次在夢裡回放着的村子，她卻在進村口的時候迷失了方向。她不記得自己的家了，二十多年的變化太大，變得讓她找不到童年的街巷、童年的家門，找不到自己曾經住過的那幾間低矮的平房。多少夢裡曾經雲錦書寄的地方，在她的眼裡頓然陌生起來，是村人長長的目光把她迎進了家門，並伸出溫暖的手，緊緊地握着。她哭了，抱着故鄉蒼老的親人。

我坐在車子的後排座上，探頭，也望見了菊子的村莊。不過是粉牆灰瓦的一片房屋，偶爾間雜着幾間紅瓦的房頂——是新房與舊屋的區別，是歲月與光陰的交替，是青春與幸福的印記。一座座屋簷下，看不見人影在院子裡走動，村裡村外亦很整齊、乾淨，與其他村莊不大相同的，菊子的村子顯然非常地靜寂。

麥子黃了，快要收割。村莊和麥子都在等待着揮動鐮刀的最後時刻。

問一問身邊懂得農活的人，麥子是哪一天收割？他們說，現在是黃稍，麥秸還青着呢，不忙收割。我們等不到麥子開鐮，許多的農事，都不屬於我們。

菊子記得，當年的麥子，是鋪天蓋地，一眼望不到地邊的。

菊子說的，好像是我的經歷、我的故鄉、我的童年少年。

村前的河，悠悠地從村前穿過，掬一捧家鄉的水，喝上一口，可找得回童年打水、挑水的記憶？

臨行，菊子在村碑前拍了幾張照片，通紅的臉頰上滿是夏陽映照的紅暈。這裡屬於海洋性氣候，田野的風大，強勁的風吹動着菊子的衣裙，吹亂了她的頭髮。她低頭頷首，目光深沉地望向身後的那塊村碑，望向村碑上雕刻的兩個凝重的紅字，眼簾垂下。

那一刻我想，會不會有兩行淚花吹落，濡進土地？我望了一眼菊子，背轉過身，我已察覺了她深藏的悲欣。

對於土地、對於故鄉，我和菊子一樣，有着相同的血脈一樣的情結，相同的漂萍一樣的歲月。

都說，故土難離。離開故鄉，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深深扎根的地方了。每個人，或許只有一個故鄉，這個故鄉只能是生命裡最初的那個，就像余光中先生的《鄉愁》一樣，情意深長，在靈魂裡，在精神上。

終於知道，她為什麼叫作菊子。菊子是風物裡兩種情態各異的標記，它像坐標一樣，延續着也豐富着詩人的記憶，塑造着一個真實的自己。如果一切都可以虛構，惟有地理的鄉愁與文化的滄桑，讓我們難以虛構。

人生在世，在行走的大地上自由來去，唯一不能自由來去的是顆懷舊的心。漂萍漂來蕩去，可以天涯海角行走，唯不能天涯海角行走的，是它的根。漂萍也離不開故土，它的故土就是那片域中的水，生它孕它的水蕩就是它的故鄉，是它生命裡的珍貴的土壤。

任何人，任何植物，只要有故鄉在，他的心就會在，根就會在，無論走到哪裡，都會與故鄉緊緊相依。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現代式婚姻

常聽人說「夫妻同飯鑊」，意思是結了婚，兩個人過着同一生活，天天吃着同樣飯菜，日久便你五官中有我，我五官中有你，漸漸就長出夫妻相。

可是到了今日新世紀，這話就未必完全準確了。可知道講求個性的年代，很多男女婚後，大都不想改變自己，婚前就算沒有立約三章，彼此也有默契，知道各有私隱，經濟獨立不用說，在生活志趣上，也得你不管我，我不管你。

同枱吃飯已異於父母輩。男的嗜酸吃辣，女的喜愛清淡，就得分碗分碟分清楚河漢界。婚後幾年尤其明顯，臉帶紅光、挺着大肚腩的丈夫無肉不歡，臉帶菜色、熱愛纖體的妻子青菜豆腐是一景；丈夫飲酒嚼肉、朝向東面的電視看球賽，背北向南而坐、邊吃邊持手機發短訊的妻子又是一景。同桌而坐分東南，也是科技發達後才衍生出的二人「新」世界。

不同食也未必同行。蜜運期間執子之手，滿以為拖到白頭到老，蜜月過後，漸漸已感覺十指不再扣得那麼緊，嚐到七年之癢，雙方回味單身之樂，出門散步，不時有意無意間，哥行前妹跟後，或是妹行前哥跟後了。

婚前外遊，你說去「東」她說好；她提議「西」你說好。婚後頭頂各有一片天，有了閒錢想到外地旅遊散心時，同一目的地「心靈感應」的浪漫已不再有，他提議去亞熱帶海灘看美女；她要去意大利米蘭看時裝。最終結果便你有你時我有我，同日上機飛到不同地方，開開心心各得其樂。

所以別以為旅行團中的單身客盡是什麼超級鑽石王老五和金枝玉葉盛中女，其實當中不少是幸福婚姻中「甩轆」的另一半。

不同食不同行，同枕也有煩惱，七十公斤大肥佬非開兩匹半冷氣睡不着，他身邊弱不禁風的美女蓋大棉被也在被窩裡發抖。那種滋味，便非情竇初開、渴望婚姻生活的少男少女所能想像。

方寸不亂

方芳

讓座吃「檸檬」

最近有遊日的網民張貼照片，地鐵裡的日本青年人倦極，寧願站着睡，也不敢坐關愛座。照片引起香港網友討論「讓座文化」，有位無人坐，是浪費資源？還是值得推崇？

公共交通席設關愛座，的確推動了社會的讓座文化，在地鐵、巴士上，自動自覺讓座的人是大多數的。我倒認為，讓座成風，有時讓錯了對象，會引起不少尷尬。

我第一次被讓座，是年前到西貢行山，行了四個鐘，回程的時候，臉容當有疲態，汗衣也不會光鮮，依稀可見的灰髮亦散亂，但一幫朋友在地鐵說說笑笑，精神還是處於興奮狀態，這時候有個孩子站起來想讓座予我，第一時間就讓我謝絕了，自覺能夠行山四個鐘，體力很好呀，怎麼還需要孩子讓座呢？

孩子吃了個「讓座檸檬」，好不尷尬，悻悻然望着鼓動他讓座的父親，就是怪父親多事。當時沒有想到孩子的感受，也沒有領略年輕爸爸教育孩子的苦心。時至今天，還是忘不了他尷尬的小臉，沒有接受他的讓座，好生後悔。

現代人容顏保養得宜，有些「凍齡美女」、「凍齡男士」，臉紋不顯現，頭髮染得光亮光亮的，衣着也年輕，六十歲人似四五十歲，這些人絕不會被讓座，只會讓座予別人，所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是外形的分水嶺，分分鐘有六十多歲的讓座予五十歲的，不忿被讓座的大有人在。

有次在地鐵所見的也搞笑，有位熱心的中年女士，起來向前面的人讓座，前面的幾個人沒反應，可能大家都不認為自己是被讓座的對象，大家愕然張望，猜不透讓座對象？該女士指向後面一位女子說：「你呀！」於是一眾目光聚焦，該女子當然也不會接受讓座。看來，也不要隨便讓座，熱心有時也會受到冷遇哩！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說說《新報》

在網絡年代或無紙年代，報章停刊不算大新聞，而早在之前，已不斷有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產生一定影響力的報章停刊，如《華僑日報》、《星島晚報》、《香港時報》、《快報》、《新晚報》等，隨着人事更替和時代變遷，曾經風光一時的報章走向衰落，就像有些名震一時的家族企業或名牌走向沒落一樣，也見慣不怪了。

但對《新報》關閉，而且關得很徹底，連網站都不保留，或轉型為免費報章，我還是有點意外，當然也有點「私情」。因為，這是我加入報界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媒體生涯中最懷念的工作，我算趕上該報或報業「最好的年代」。

《新報》於一九五九年由時任環球出版社老闆羅斌創刊，一直走大眾化路線，所以，一般的讀者對《新報》的最深印象可能是它的馬經版，老一輩的則會記住其副刊的連載小說作者，像倪匡、亦舒和岑凱倫等。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其實，《新報》是香港首份以彩色印刷的報紙。當時，它的彩色版不但提高了報章的格調和影響力，也成為本港其他報章的學習對象。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新報》，當時，年事已高的羅斌打算慢慢淡出報業，欲將業務交給兒子羅威。羅公子新人事新作風，希望該報不僅僅是一份大眾化報章，還要有特色和影響力。於是，找來一批有理想的年輕人，包括龍景昌、何良懋、陳慶源、曾廣標和馬龍（漫畫家）等「五君子」，銳意改革報章，以期在當時百花齊放的報壇脫穎而出。

「五君子」日夜「腦震盪」後，既學習又模仿外地報刊先進經驗，引入一些新思潮，加強視覺效果，以及雜誌式的深入報道和評論，以周刊形式推出，如《星期一評論》、音樂版《魅力都市》、周三的《社會實錄》、周四的《城市縱橫》和周末的潮流版等，其財經版還學用《金融時報》般的淺橙色紙張印刷，排版別具一格，予人新鮮感，有別於傳統報章的死板；內容也新潮和充滿知性，並具有批判性和社會性。因而吸引到一批年輕專業人士。

當時的《新報》是《東方日報》、《成報》之後的第三大暢銷報章，在影響力上亦不遜於排第四位的《明報》。可惜，好景不長。

（上）